

宋夏史研究

李华瑞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宋夏史研究

SONG XIA SHI YAN JIU

● 李华瑞/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夏中研究/李华瑞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696-335-9

I. 宋... II. 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
宋代②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夏(1038~1227)

IV. ①K224.07②K24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1866 号

宋夏中研究

李华瑞/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蓟州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30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696-335-9

定 价:28.00 元

本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
科研奖励计划”资助项目

前 言

本论文集共收录二十八篇文章,除几篇有关宋夏关系的论文发表于20世纪90代外,大多数都是近几年完成的。选编这部论文集不是敝帚自珍,而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为完成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确认的任务,二是被选编的论文在发表时,因校读不甚仔细,或屡经传抄和打印以及其他原因出现的鲁鱼亥豕的差错,希望有一个更正的机会。论文大致可分为四部分:第一组是关于学术史回顾;第二组是宋史方面的;第三组是西夏史和宋夏关系史;第四组附录收了两篇自编书的序论和对先师漆侠先生的访谈。其中《朱熹的攘夷救荒思想》发表时与王海鹏共同署名。文章在选编时,一般不做改动,只是在发表时限于篇幅和字数而被删减部分,此次收录恢复原貌,如《〈宋史〉论赞评析》。《中日“唐宋变革”观比较》原文发表时改为《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此次收录仍改回现名。限于作者学识水平,书中一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谨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帮助和支持这部论文集的出版,表示衷心地感谢。

李华瑞

2006年9月7日

目 录

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	1
中日“唐宋变革”观比较	29
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44
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69
宋代思想的新诠释	81
中国烧酒起始的论争	98
《宋史》论赞评析	106
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	129
北宋治河与防边	136
林希与《林希野史》	154
朱胜非与南宋初期和战	176
朱熹的攘夷救荒思想述论	190
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	205
论宋代乡村客户的流动	228
宋代的酒	242
《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读后	250
20 世纪党项拓跋部族属与西夏国名研究	255
西夏纪年综考	271

论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	283
西夏巡检简论	295
论宋夏战争	309
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320
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	339
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351
《西夏经济史》评介	361

附录

《中国十大明君外传》前言	369
酒文化中的民族性格——《中华酒文化》代绪论	373
漆侠先生访谈录	377

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①

一、研究概况

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 55 年的发展历程中是很不平衡的。以 1980 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可把 55 年来的宋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 1950 年至 1979 年,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中,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从 1980 年至今宋史研究进步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这主要是指大陆地区,台港地区的宋史研究没有大的起伏,一直处在较为平稳的发展状态。台港地区的宋史研究将分专节叙述,下面按两个时期概述 55 年来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状况。

其所以说前一阶段宋史研究发展缓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相对于中国古代史其他各断代史,宋史研究起步较晚,当中国自 20 世纪初用近代科学观点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历史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从对现实局势的反应来说,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国家积弱受侮的情势下,所向往的是武功、文治兼备的汉唐盛世,对不能增加国族光彩的宋代不屑一顾。从材料扩充方面来看,宋代的考古资料在考古学上意义不大,不能推翻典籍文献的记载,在研究上的价值也不大,加以文献资料的繁芜杂琐,又不是短时间可以厘清的。因此,当国人关切、投入

①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庆祝建所 50 周年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论坛”上所作的讲演。

国史研究之初,宋史既不像汉唐盛世,吸引学者的兴趣,也不似考古、汉简、敦煌、明清档案那样成为新学术的要角,它无疑是较被学者忽视的一个朝代”^①。这种忽视的结果,造成了宋史研究队伍的严重匮乏,及至建国以后研究者屈指可数: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聂崇岐、张亮采、程溯洛、束世澄、张维华、华山、何竹淇、张秉仁、吴天墀、漆侠、沈起炜、王云海、关履权、万绳楠、朱家源、酈家驹、李埏、倪士毅、徐规、王瑞明、李涵、姚瀛艇、陈守忠等二十数人。

二是相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宋史研究,很少能听到大陆学者的声音。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从唐宋变革观的角度提出宋代是近世开始的论点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 1905—1963)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乐观的设想,他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制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性的宋史研究计划(Leproject Song)。虽然在他生前未能实现他的“宋史计划”,但1964年在法国波尔多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学家大会上,通过了继续完成白乐日的“宋史计划”的决议,嗣后便陆续出版了多部宋史著作。白乐日的宋史计划时至今日虽未全部完成,但它的确一定程度推动了欧美的宋史研究^②。与此同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不论是发表的论著,还是学术交流,都有较大的发展,并成为世界范围内宋史研究的两大中心。而我国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不仅显现出“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而且问世的论著也相当有限,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形成鲜明的反差。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79年大约发表了2000多篇

① 黄宽重《宋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原刊于《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后收入《史事,文献与人物——宋史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

② 详见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7页;宋晔《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台湾)《华学月刊》124期,1982年4月;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0页。

论文。如果除去1966—1976年间带有很浓政治斗争色彩的文章,有一定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足1200篇。而有一定学术分量的专著就更少得可怜,还不到10部。这种状况正如邓广铭先生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致开幕词所言:“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也迄今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的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才,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①

当然,20世纪50—70年代宋史研究发展缓慢,并不等于说没有取得成绩,至少在两方面是值得称道的:一是在农民战争、王安石变法、岳飞、经济重心南移、封建地主制经济、土地制度史、人物评价及人物传记、文物考古、文学艺术等课题上取得较大进展;二是三十年间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宋史的学者从二十多人到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时全国研究宋史的人员已达六七十人。像毕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杨德泉、柯昌基、吴泰、戴静华、郭正忠、陈振、胡昭曦、朱瑞熙、王曾瑜、陈智超、贾大泉、裴汝诚、杨国宜、梁太济、高树林、周宝珠、杨渭生、乔幼梅、张邦炜、龚延明、何忠礼、李裕民、许怀林、郭东旭、葛金芳等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从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前辈学者,一道撑起了大陆宋史研究的骨架。

从1980年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目前的宋史研究现状已有很大改观,这有四个标识:

其一,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国内地宋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中国宋史研究会是全国宋史研究者自愿结

① 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宋史研究论文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她以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及发行《宋史研究通讯》的方式,团结宋史研究工作者,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砥砺学术,推动宋史研究。自成立至今,中国宋史研究会已先后在上海、郑州、杭州、石家庄、开封、成都、昆明、银川、保定、兰州、华蓥举行了十一次年会,共出版 10 部论文集,第 11 部论文集正在编辑中。从 1980 ~ 1992 年邓广铭先生担任第一任会长,漆侠先生从 1992 年至 2001 年担任第二任会长,2002 年推选朱瑞熙、王曾瑜担任第三任会长。中国宋史研究会还协助杭州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于 1985 年、1991 年、2000 年召开三次国际宋史研讨会。中国宋史研究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通讯》已刊行 43 期,发行到海峡两岸、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具有较大影响力。

其二,研究成果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4 年间,共发表近 13000 篇论文,平均每年约有 500 多篇;研究专著约计近 400 种。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军事、法制、经济、财政、文化、艺术、教育、学术、思想、社会、生活、科技、地理、史学、性别、地域、宗教等宋代历史的方方面面。研究成果的质量亦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

其三,研究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新人辈出。迄今为止中国宋史研究会已有会员 325 人。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已成为能够专门招收和培养宋史方面的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基地,每年发表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已是宋史研究众多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宋史研究后继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于 2001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本学科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将建成国内外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

其四,形成较为固定的出版阵地,据笔者所知,现今河北大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均编有“宋史研究丛书”、“宋代研究丛书”等。《中州学刊》、《河北学刊》、《河北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设有宋史研究固定专栏,中国宋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均定期编辑宋史研究方面的论集、专集、辑刊和论丛。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编辑的《宋史研究论丛》从2003年起每年出一辑,向中国、日、韩、欧美征稿,并拟以汉、英、日、韩四种文字出版发行。受中国宋史研究会委托河南大学承办的“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网站也于2004年4月23日正式开通,网址是:[www. songdai. com](http://www.songdai.com)。“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网站的开通,为宋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交流阵地和平台。欢迎各位关心宋史研究的同仁光顾“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网站。

二、研究方法和取向

1949年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但如何学习和运用这种科学理论和方法,却又走了弯路。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与其他的科学研究活动一样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而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所谓“历史研究”却甚嚣尘上。在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下,50—70年代的宋史研究最为关注的是两宋时期的政治斗争,因而,两宋时期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么领导的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宋与辽、西夏、金、蒙元之间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宋史研究的三大主旋律。1973年到1976年10月在“四人帮”掀起的“批儒评法”闹剧中,王安石及其变法也被置于儒法斗争之中而遭到严重的扭曲,而评“水浒”、批宋江活动又人为地拔高了宋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7—1980年宋史研究仍以王安石变法评价、宋江投降与否问题、岳飞与爱国主义、三次农民起义等课题为主而展

开热烈讨论,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毋庸讳言,这几年的矫正性论文仍然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烙印,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宋史研究的课题面开始不断扩大。

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以后,在邓广铭、陈乐素等前辈学者倡导实证研究风气的影响下,近20年间除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漆侠、李埏、葛金芳、李伯重诸学者仍坚持理论性的探索而外,实证性研究已占据主导地位。热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风。这可举一个突出例证:《简明宋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周宝珠、陈振共同主编出版的国内第一部断代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则是陈振先生独自于2003年出版的一部新的断代宋史。从编写《简明宋史》到《宋史》一书的出版,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比较一下两书的不同,就不难发现《简明宋史》与《宋史》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有很大变化。《简明宋史》编写出版之际,虽然急风暴雨式地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学说也开始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但是这种退出并不能一蹴而就,因而《简明宋史》不可避免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对反映阶级斗争的史实内容有较多的叙述,单述农民起义的篇幅就占全书的六分之一,而《宋史》所述农民起义的篇幅不及全书四十分之一,变化之大于此可见一斑。与此相应,过去因研究不足而被忽略的各种典章制度,包括行政、军事、法制、户籍、赋税、役法等则得到很大的充实,其篇幅差不多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强。这一减一增的变化,实际上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宋史学界研究取向变动的一个缩影。张其凡新近编写的《宋代史》(上、下册)亦反映了这个特点。

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改善、研究方法和倾向的多样化,又促进学术氛围的日渐活跃,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在充分展示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如:“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祖宗之法、皇权与相权、重文轻武、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党争、岳飞与秦桧、政治史分期、地方行政区划、宋与辽、西夏、金、蒙(元)关系;役法、货币地租、钱荒、户口统计、客户身份、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权的集中和转移、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革命;科举制定义、宋学与理学的关系、

理学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妇女地位、律与敕的关系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证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美国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在总结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变化时指出:“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①虽然国内宋史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和刻意追随西方历史学研究取向的转移,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而成为典章制度史之外的又一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而且问题研究微观细化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 20 世纪末至今国内宋史研究取向又有新的变动。

1. 跨朝代与断代的整合研究

10—13 世纪中国历史是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次大分裂时期,辽宋西夏金等政权相继对立并存,这些政权虽在政治、军事上是对立的,但经济文化却紧密相联,互相补充,是中华民族形成极为重要的时期。然而,长期以来宋、辽、西夏、金史的研究者多是各自为阵,严格划分此疆彼界,其研究充其量属于大区域史研究,而缺乏从 10—13 世纪全方位的整合研究,因而,对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认识是不完整的。近年来,这种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的陈式正在逐渐被打破,实际上进入 21 世纪后,完成 10—13 世纪全方位整合研究的条件已渐次成熟,因为经过 20 世纪的辽史、宋史、西夏史、金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各个断代的基本问题已被厘清,为打通辽宋西夏金史间的壁垒进行整合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集合全国力量正在编纂《辽宋西夏金断代通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从事的《10—13 世纪文化的碰撞与融

①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3 页。

合》课题也已有了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整合研究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辽宋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是横向的,那么,把宋向前追溯至唐,向后延及元,则是纵向贯通研究。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中唐以来的诸多社会变化至宋始得以完成,而唐宋转型又对元明清历史影响甚大,但是20世纪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者都缺乏这种贯通性研究,因而,使许多问题的研究不能深入,甚至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具体表现就是唐宋变革,日本学者在20世纪曾给予高度重视,写出一大批论著,而且流风所及对欧美乃至我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而在国内除讨论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时有所涉猎外,很少有系统论述。进入21世纪,这种状况开始转变,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唐宋经济史”、“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唐宋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1年度设立唐宋政治经济制度的传承与变化为课题指南,2001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的重点科研项目,以及“唐宋武将制度变迁”(2001)、“唐宋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演变”(2002)、“唐宋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环境关系研究”(2003)、“唐宋城市比较研究”(2003)、“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2003)等一般项目。

当然,这种贯通性的研究正在起步,要取得大的成绩,还需做艰苦的工作。

2. 研究倾向的变动与学科界限的打破

建国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宋代经济史、典章制度和人物评价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史、文化史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近年来,研究倾向更趋多样化,士人阶层、

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宋学诸学派等课题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研究倾向转变的同时,学科间的界限也日益受到挑战。宋史研究中诸领域间,如经济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法律与社会、民族与文化,甚或综合更多领域间的互动研究倾向在近年已初见端倪。如讨论宋代士人、家族就往往将文学、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做综合考察;又如讨论宋代思想则关注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学之间的联系。思想史解释资源范围扩大,社会史、经济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文献学、考古学等所依据的资料大量进入思想史的视野。

3. 资料范围的拓展与学术自觉意识^①

近年来,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他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

^① 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总第44期)。

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史学研究必须从目前相当程度存在的‘自主’状态,走向对方法论、论题意义、学术规范有意识的‘自觉’。”此次会议的论文已结集出版:《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包伟民主编)。李华瑞新近出版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也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九百多年来不同时期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的方法和观点。

三、重要成果介绍^①

建国以来,宋史研究取得最重要的成果是恢复和提升宋代历史在祖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长期以来,一提到宋代总是与屈辱、贫弱相联系,即使像学富五车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也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也有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方面,宋代是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关于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港台、海外华人学者们在讨论宋代经济的进步时,一致认为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为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②。漆侠先生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③。在文化方面,宋代亦是高度繁荣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超迈唐代的长足进步。在各类制度方面,亦有不凡的建树,对后世产生颇大影响。因而,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

① 本节参考了王曾瑜《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辽宋西夏金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总第30期)。

② 全汉昇《略论宋代经济的进步》《大陆杂志》28卷2期,1964年。

③ 《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